

※採訪報導※

朱維錚教授談近代經學史研究相關問題

楊晉龍、蕭開元整理*

時 間：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

地 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三樓討論室

主持人：林慶彰先生

周予同先生（1898-1981）是錢玄同先生（1887-1939）的學生，曾經負責《教育雜誌》的編纂，因此寫了不少傳統教育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和近代教育相關的研究文章，同時也做過有關中國學制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國學校制度》（1930）、《中國現代教育史》（1934）。至於周先生研究經學史，首先從「疑經」開始做的是「辨偽」的工作，再從經史的關係入手，最後纔做經學史的研究。所以會寫經學史的研究，主要是當時政府將經學史研究納入十二年的建設計劃中。編纂周先生《經學史論著選集》是有感於當時出版的書，大多數是「遺集」，所以希望能為周先生出版一本「生集」，沒想到書交到出版社以後，就產生了一些問題，無法如期出版，等問題解決後，周先生就在出版社通知可以出版的前幾天過世，編纂「生集」的願望也就落空了。原因是周先生有個習慣是文章發表之前，總要交給自己的學生幫忙整理一下，而且很客氣的共同署名發表，某位學生就因此而獲得這個共同署名的機會，而得到不少好處；另外在「文革」前周先生有一些稿件，也交給這位學生整理，周先生自己並沒有留下副本（周先生在「文革」前曾自焚手稿），後來要出書，向那位學生要稿件，沒想到那位學生聲稱那些稿件已經在「文革」抄家的過程中遺失（實際上沒有被抄家），所以無法交出。甚至還以他和周先生共同署名發表的文章「著作權」未明的名義而到處投書，想要阻止周先生

* 楊晉龍，本所助研究員。蕭開元，本所「揚州學派研究計畫」約聘助理。

《選集》的出版，因而延誤了出版的時間，使得原本是「生集」的書變成「遺著」，所以朱先生纔在《選集》（1996.7）的〈增訂版前言〉中說了一些重話，後來纔發現那位學生已經將周先生和他署名整理的稿件，用自己的名字在臺灣發表了。朱先生雖是周先生的親密學生之一，但當時最大的興趣，在遼、金、元等邊疆民族和漢人的關係，並無意做經學史的研究。然而由於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感受特別深，覺得現代中國人許多陰暗的負面行為，實際上和古老的傳統有關聯，尤其經學自秦始皇統一中國（西元前 221 年）以後，直到清朝滅亡（1911）只能說是「經術」在起作用，而「經學」則僅是在野的旁觀而已。

朱先生每兩年在復旦大學開一次「經學史」的課程，有一些學生選修，也有一些學生做出研究成果，一般來說成績並不是很理想，倒是有一位法國的留學生名字叫陳艾蘭（譯音），做的是《公羊傳》何休《註》的研究，成績不錯。至於大陸其他儒學研究所或學者的儒學研究，有很多是配合政府政策的「政治化的儒學」，並不是純粹的學術研究，真正的學術研究是不能跟著政府當局的喜好走的，這樣的研究纔能得到真相。

朱先生在學術上引起最大爭論的是有關孔子的研究。這件事是因為朱先生為蔡尚思先生（1905-）潤稿（案：應是《孔子思想體系》，1982 年）時，幫蔡先生補了一章孔子的傳記，沒想到蔡先生的書發表後，許多傳統儒學研究者即針對朱先生補充的文章之觀點，提出相當多的批評，朱先生不願蔡先生為他「背黑鍋」，因此發表了一篇質疑《論語》是否可信的文章，其實這是清人早就已經提出來的老問題（如崔述，1740-1816），沒想到惹火了匡亞明老先生（1906-），到處找人要他們寫文章批駁，因此成為一九八三年以後現代研究經學史中一個爭論的問題。不過「總批判」（案：蔡先生有《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和《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補編》，1950 年）是對傳統的見解加以批判，但絕不是對傳統的「總否定」，這是他們誤解的原因。其實為孔子做比較詳細傳記是周先生生前的志願之一，周先生早期曾在開明書店出版過一本薄薄的小書《孔子》（1934），惟其中無法處理的事情不少，因此希望能寫出更詳細的《孔子傳》，可惜一直未能完成，朱先生不過是替周先生完成一項遺願而已，沒想到卻引起這麼大的爭論。

現代新儒學真正的祖師爺應該是熊十力先生（1886-1968）。《讀經示要》（1944 年完成，1945 年出版）係由徐復觀先生在抗戰時幫熊先生出版的書，這本書對現代新儒學淵源研究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因為這本書基本上是熊先生為回答徐

復觀（1903-1982）、牟宗三（1909-1995）等學生的問題而寫的講稿，是熊先生早期較有系統討論傳統經學思想的書，更是徐、牟等走入新儒家研究的重要誘因之一。想探討現代新儒家思想淵源者，不應遺漏此書。一九五〇年代以後，和熊先生聯絡來往的僅有王元化（1920-）、周予同兩位先生，熊先生當時的處境是非常困苦寂寞的，不過他在「文革」以前就已過世。當時朱先生對熊先生的學問，並沒有什麼興趣，因此有關周、熊兩位先生交往的詳細情形，以及周先生對熊先生學問的意見或評論，周先生既沒有留下文字記載，朱先生也因為沒有興趣，所以也沒有做任何紀錄，現在要重新回憶也無法完全說出來，真可惜。至於王元化先生是否有留下紀錄，則不得而知。

朱先生自認研究經學史和以往諸如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日本人本田成之（1882-1945）《支那經學史論》等比較不同的地方是：

（一）從材料的研究著手。最近應出版社之邀編輯一套《傳世藏書》，其中有關經學史的《經學卷》，共收書二十一種，每書之前均有「提要」和「說明」：從漢代的《伏生大傳》開始，一直到章太炎（1869-1936）的《國故論衡》（1905年出版）止，中間加入了明代邱濬（1421-1495）的《大學衍義補》。朱先生認為從目錄學、小學等入手來研究經學史纔是最正確的道路。資料是研究歷史的根據，也是歷史的表徵，因此資料的收集、應用非常重要，而經學史的資料朱先生以為可以用各個不同朝代的著作為代表。這就是在編纂《傳世藏書》中《經學卷》諸書前提要或說明可以觀察到的重要內容。

（二）切入點不同，經學成為經術，而經術則是統治的學說，這是中國中世紀（西元前221年至西元1911年）經學的真相。以往的經學史研究都是經書的解釋或歷史發展的過程，從經的定義、經傳的演變、詮釋的內容、門派的形成和傳承衍化等等來談，這類工作當然是必要的工作，但這不是經學歷史的研究。經學歷史的研究必須有切入角度，例如皮錫瑞《經學歷史》非常簡單：與孔子相關者，即為經學；馬宗霍（1897-1976）係章太炎的學生，其《中國經學史》比較平庸，有關唐宋之交的經典研究則較佳；本田成之的內容錯誤較多，評論亦多不準確；范文瀾（1893-1969）是黃侃（1886-1935）的學生，其《群經概論》一依古文學家的方法來研究，因此較重視考證的工作，也比較繁瑣，這本書由顧頡剛先生（1893-1980）主持的「樸社」出版。當時顧先生的作為未必做的很好，也未必如今人所說的那個樣子，他的「日記」已經整理好，最近就要出版，對他的瞭解可以更加方

便。范氏的見解拘泥於古文學家的說法，見識不高；周先生的《群經概論》則較偏向今文家，具有改革的傾向。五四時代大學的研究學風，大約可以分成兩派：南方傾向保守、北方見解較開放，范、周二位先生的兩本《群經概論》，正好代表當時研究經學史的兩種取向，他們共同的問題是經典由來和經典的研究不足；經學的發展與派別的研究也不足。朱先生認為自己的研究比較傾向於將經學看成是中國中世紀的統治學說，這一段歷史是完全專制的統治形勢，在這種統治形勢之下，經濟的變化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資本主義萌芽的時間也就有不同的認定：或從明末清初開始、日本人則認為從宋代開始，其實所謂資本主義的萌芽從明末開始是毛澤東（1893-1976）的意見；至於封建社會從什麼時候開始，自從全國批評尙鉞（1902-1982）的觀點以後，則無人敢再發表不同的意見。

（三）經學史與科學考試的聯繫。中國的經學發展與唐以來的科舉制度聯繫在一起，所以張之洞（1837-1909）在一九〇五年廢科舉時，其實也同時廢掉了經書、經學，亦即廢去經學成為統治學說的基礎。統治學說史一開始即以「後說」否定「前說」為發展的常軌，所以「獨尊儒術」，其實是這個過程中正常發展的結果：首先是漢代初期的黃老取代秦代的法家，成為統治學說；其次是漢武帝（西元前156年-87年）時儒術取代黃老而成為統治學說，因此所謂「罷黜百家」是指黃老，實際上漢武帝也未全用儒家人物。至於經學能成為統治學說，公孫弘的功勞甚大，公孫弘（西元前200年至121年）的學術淵源今天並不清楚，從史書中引錄的文章來看，他的見解非常膚淺，是否即儒家人物恐怕需要重新斟酌。公孫弘最大的功勞是建議漢武帝招收博士弟子員，並且以此為朝廷任官的基本條件，亦即將博士官由顧問官變成教育官，並且成為候補文官制度中的必由之途；而博士官全由今文經學家專任，於是經學家壟斷了候補文官的教育權，《漢書·儒林傳》所謂：「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冊5，卷88，頁3596），從此以後更影響了一般的教育內容，經學因而也成為中國唯一的統治學說。

（四）「學」與「術」不同，而「學」隨「術」變。就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來看，「學」是可以討論的，而「術」則不能討論，在漢代的文章中，漢人對經學和經術、儒學與儒術是分的非常清楚的，他們對「學」做了不少發揮，在後代也同樣容許學者繼續發揮。至於「術」則是做官必備的學問，《漢書·夏侯勝傳》所謂「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冊4，卷75，頁3159），可以為證。「學」是探討未知的事物，因此可以研究。中世紀的學術研究形成一傳統：重視經

術，故經學雖有研究，但隨術的取向而變化，主要研究的書籍之選擇、學問門派的消長變化，均與術有密切的關係。後漢劉秀（西元前 6 年-西元 57 年）雖因王莽（西元前 45 年-西元 23 年）重視古文學而立今文博士，但到其子明帝（28-75）時已開始重視古文學，所以教導皇親國戚的「四姓小侯學」^①中的老師，多聘古文經學家任之。古文學家賈逵（30-101）甚至在《左傳·昭公 29 年》：「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卷 53，頁 922）之文中，為漢代皇帝找到祖先最早的來源：劉累，而證明「漢為堯後」而居「火德」的歷史直接證據，這是「經術」而不是「經學」。從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鄭玄（127-200）及王肅（195-256）的融合古今學、北學與南學、隋唐經學，隋朝的統一在政治上是北統一南，在文化上卻是北方文化深受南方的影響；北宋和金朝亦同，金朝吸收南宋文化，因此朱熹（1130-1200）的學說在金朝首次成為官學，蓋南方文化自由度高，所以發展程度也比北方多元。唐代《五經正義》以後，開始出現革新運動，例如《四書》中的《孟子》，從唐玄宗（685-762）開始受到重視，其升格為「經」到朱子時完成，而統治學說也由過去的以《五經》為主；改由《四書》取而代之，程朱的地位亦取代了鄭玄的地位。在這個經學詮釋改革過程中的樞紐人物是王安石（1021-1086），他的《三經新義》長期影響中國。

（五）經學在明朝正德（1506-1521）以後的發展，形成一種自我否定的過程。朱先生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未完成的革命》一書中，主要是選輯十九世紀一些短篇文字，已見其變化過程。基本上經學發展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間以後，即變成一不斷被否定的過程，亦即梁啟超（1873-1929）所謂「藉復古為解放」的過程：首先否定左派王學，然後是王學、朱學、唐學、古文經學、今文經學，到晚清章太炎的《諸子學略說》即否定了政治化的孔子（案：章氏〈訂孔篇〉已貶抑孔子）。而《新青年》的編纂群則多為章氏之弟子，改革派隨清朝的終結而終結，革命派佔了上風。周先生認為經學不必研究，而經學史應該馬上展開研究；朱先生以為如果不研究經學，根本就無法深入的研究經學史，因此認為經學與經學史均應該研究，這是他和周先生在研究的主張上稍稍不同之處。

① 《資治通鑑》曰：「帝（劉莊）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冊 2，卷 45，頁 1449-1450。

最後，朱先生認為他的經學史研究有下列幾個特點：

1. 從文獻整理開始。
2. 經學係統治學說之主軸。
3. 經學變成經術後，經學發展形成學隨術變的過程。
4. 經學發展到晚明為止，晚明以後則是自我清算、歷史倒衍過程。

問題與討論

林慶彰先生：

朱先生談周予同、熊十力，在經學流變方面，又給我們很多的啟發。在座各位是否有寶貴的意見想與朱先生討論？

張壽安女士：

聽完朱先生的演講，感覺上好像上了一堂課，而且課程的內容相當豐富。不過，我想提出兩個問題向朱先生請教。第一個就是我非常贊成朱先生所說經學作為一個統治術的觀念，但是就文化層面來說，經學有時不一定要與科舉制度扯上關係，也就是經學在一般民衆中的生活性質，即文化層次。是否可以請朱先生說明文化層面與「學隨術變」的關係。另外就是「學隨術變」在官方的層面確是如此，如公孫弘、董仲舒將儒家的經典變成一種治術的時候，也造成了科舉制度中所謂的官方的經書定本，如朱熹的學說在科舉制度中的重要性。但是在這段期間中，知識界也有某些反動的聲音，特別是像朱先生所提到在晚明到晚清的這段期間中，知識界的反動力量是相當大的。是否可以請朱先生說明知識界的反動力量與「學隨術變」的關係。

朱維錚先生：

關於文化層次與「學隨術變」的關係，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我認為是「因俗而制」。中國的疆域是相當廣大的，許多的風俗是和它本身的生活及文化所形成的，後來有些人便將這種風俗及文化放進儒學中一起研究，在我看起來正好是倒過來的，是先有這個風俗，然後有人用所謂儒學中的觀念來解釋它，也就

是給它一個解釋體系。這就是經學成為統治學說之後，地方上掌管文教的官員所給它的一種解釋。然而這種解釋形成之後，它會起一個導向作用，也就是說，將這個風俗納入這個解釋體系之中，以符合統治學說的目的。這是我不太贊成的一個觀點，如果說以某一種東西來改造它，這個地方的風俗就會變了，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風俗是一種長期形成的過程，所以有些東西並不能從這個角度來解釋。至於「學隨術變」與知識界反動勢力的關係，我比較傾向章太炎的解釋。章太炎說中國知識份子向來有兩類人物，一類是替統治者說話的人，是追求富貴功利的人，這種人多與統治者在一起；還有一類是與統治者進行抗爭的人，比如像今、古文學的抗爭運動。但是統治學說的要求並不是要去求出真理，所以知識界的反動勢力升起，而這股反動勢力，同時也是一個變化統治學說的過程，因此「學隨術變」的理論與知識界的反動勢力並無衝突。

林月惠女士：

非常謝謝朱先生為我開了很大的眼界。在這裡我有三個問題想要請教朱先生。第一個問題就是朱先生提到周予同先生說「經學史的研究才開始，但是經學的研究則可以不必」，你不贊成這個說法，那如果說是經學的研究有它的一個價值，那麼以朱先生的看法，我們研究經學的時候，要如何的去作定位？以及經學與現代學術之間的對話，要從何處去作一個切入點？第二個問題就是朱先生認為經學史是一個中世紀的統治學說史，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朱先生對它存有一個很大的批判性，那麼朱先生在用「中世紀」這個詞時，是不是與西方的「中世紀」來作一個對照？第三個就是朱先生剛才提到熊先生的晚年十分的窮困寂寞，常常去看他的就是周予同先生，因為我們對熊先生的晚年並不是很清楚，那麼熊先生與周先生的對話中透露了哪些訊息出來？能不能請朱先生為我們解答。

朱維錚先生：

第一個關於經學的研究還有什麼價值，我是這樣想的，我總覺得中國的文化有非常豐富的傳統，這些傳統都是作為我們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部份，我們應該要加以認識、加以研究。至於說到這些研究對於今天有什麼用，我就知道了，因為根據我的考察，若是以歷史作為借鏡的，從來沒有一個成功的，就像司馬光自我諷刺的說他所寫的《資治通鑑》，只有一個官員讀過，其他的人都把他的書撕碎了，也就

是說，這面鏡子是失敗的。其實我比較欣賞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的一番話，黑格爾說我們「現在很多的人，總想把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介紹給現在的政府、君主與國家，但是卻沒有一個政府、君主及國家可以把歷史的經驗當作借鑒的。」所以歷史的事件只能當成一種很重要、必要的回憶，也就是說，對於我們現在不管是經學還是其他的歷史經驗，都是如此。

林月惠女士：

我想我的表達可能讓朱先生有些誤解。我並不是站在一個實用的角度說經學對我們現在有什麼作用，而是我覺得一般在中文系談經學的時候，往往感覺到經學是一個封閉的語言，封閉的一個討論系統，無法展現經學的活力，我實在無法理解這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似乎是只有研究經學的人才可以互相討論，在經學領域外的人就無法與研究經學的人互相討論，這種現象究竟應該要如何去突破，去吸引更多的人？

朱維錚先生：

這個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但我覺得我們研究學術的任務，有一點就是要讓現在的人，去知道我們有哪些東西是仍然還在活著。如果我們可以將這個提出來討論，我想現在的人也許會比較容易感興趣。關於您問到的「中世紀」的問題，我所說的「中世紀」，主要是從君主專制成為政治的主要型態開始，也就是所謂統一王朝的開始，一直到它的結束，因此我是就政治型態來說，從秦代的統一開始算起，一直到清代的滅亡。至於說經濟及文化方面，我以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至於熊十力先生與周予同先生晚年的關係，因為周先生所有的手稿，在文革開始的時候都燒光了，根本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所以相當的可惜。

周昌龍先生：

我非常佩服朱教授的博通，把整個的經學史作一個貫通的詮釋，如數家珍，使我大開眼界。在這裡我有一個概念上的懷疑，就是朱教授所講的「統治學說」的概念。因為我閱讀周予同先生的經學史著作，其中有一個觀念就是他認為經學到了新文化運動之後、甚至更早，經學時代就結束了，之後就是國學時代的開始，所以章太炎已經是國學大師，而非經學大師了！我想周先生與朱教授的觀點也許會有些相

同的地方，是不是都將經學看成統治階層的學說，所以面臨一個新的時代，政治環境、社會組織和經濟結構改變了，也就造成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可能是有這樣子的關聯性，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理解，大家未必都是如此。如果我們將經學說成是統治階層學說的概念，修正為經學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學說，我想問題的結論可能會不一樣。因為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話，這是一個廣義的統治，所以每一個時代作為典範性的學說，其實都是對上一個典範的挽救、反動、補充或是破壞，我們看到了王學破壞朱學，後來的人又破壞王學，如果用梁啟超的理論將歷史反推回去，這裡面就會出現問題，因為反王學並不等於反經學，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梁啟超反王學的的目的是在建立一個新的經學。所以我想不管是王學也好，朱學也好，甚至是清儒的經學與後來的新經學，我想除了學術的目的以外，背後應該還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如何維持社會的秩序。如果我們以這個為研究中心，我想經學到今天更有它的時代意義。因為我們在面臨了西方的衝擊之後，怎樣的來重組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這些問題都是當務之急，而這些問題並不能單從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理論來解決，因為我們有一個本土的問題，而這個本土的核心問題，就是以經學為代表的文化價值的問題，與這個價值所散發出來的制度與組織層面的問題，所以我們的家族制度和西方家族制度不可能一樣。所以我認為近代的經學，仍然有它的時代意義，因為經學不能再以統治的方式出現，而是一種民主化的方式，也就是在概念上必須要轉變。我希望朱教授能給我一些指正。

朱維錚先生：

我是一個學歷史的，所以我想如果能夠把一個歷史事件儘量的說清楚，就已經很不錯了。至於如何去改造社會，我想作為一個公民，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見解，但是我們自己的研究和社會改造的關係，我想是相當的複雜，因為中國歷代的經學家，都認為自己的說法能夠達到經世濟民的目的，比如說戴震，他對現實的問題相當的關切。但是這些人如何將自己的研究與改造現狀結合起來，這恐怕是有點問題。另外，我並不將經學當作是統治階層的學說，而是統治學說，就是站在統治地位的一種學說，這個學說如果不弄清楚的話，我想對中國其他歷史方面的東西，都不太能夠釐清所有的關係，這就是我作歷史研究的目的，同時也是認識我們的過去。我想這是需要大家的努力。

